

## 理论探讨

# 欧洲化: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新视角\*

林民旺

**[摘要]** “欧洲化”成为当前研究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新视角。本文探讨了欧洲化视角的兴起,介绍了欧洲化视角的发展历程以及理论的操作化。作者认为,传统理论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看作是国家或社会行为体影响欧洲层面制度建设的过程,而欧洲化视角则突破了这一局限,转而聚焦于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对成员国的影响,因此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的一大进步。

**[关键词]** 欧洲化;政府间主义;新功能主义;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755(2009) 02- 0050- 54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必然带着一定的理论取向。一定的理论指导着我们认识事物的某一方面(尽管不是所有方面)。理论使人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具有前瞻性。缺少理论自觉的认识是一种“盲目”的经验观察。“好的理论总是能够选择出某些最重要的或者相关的因素以指导我们对事物的解释”。<sup>[1]</sup>无疑,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研究也不例外。已有的两种传统理论——政府间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是研究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理论。然而,这两种理论都只关注到成员国及其社会层面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最新发展的“欧洲化”视角突破了过去视角的这一局限,转而关注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对成员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目的在于介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的最新成果——“欧洲化”(Europeanization)视角。本文首先考察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理论研究,其次考察欧洲化概念的内涵及发展背景、历程,着重对欧洲化视角的具体研究进行梳理,最后是简短的评论。

### 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两种传统视角

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理论探讨可以归入一体化理论的大范畴,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理论立场。

第一种理论立场是政府间主义,又可以分为现实政府间主义(Realist Intergovernmentalism)和自由政府间主义(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雷蒙·阿隆的学生斯坦利·霍夫曼是现实政府间主义理论最早的代表。在霍夫曼看来,欧洲一体化之所以能够启动是由于政府间的合作。成员国政府的合作意愿及偏好控制并决定了一体化进程的速度与发展水平。这一理论反对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外溢”概念,认为超国家层次的权力是由成员国政府赋予的,欧盟只是成员国利益的代理人。后来,安德鲁·莫拉维斯基(Andrew Moravcsik)结合了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双层博弈理论(two-level game)和国际机制理论、国际谈判理论,创立了自由政府间主义。尽管莫拉维斯基声称自由政府间主义反对传统的政府间主义,认为传统的政府间主义忽视了国内层面因素。从理论内核上看,自由政府间主义和现实政府间主义的核心是一致的。它们在一体化进程的解释上共同持以下的核心观点:(1)一体化的行为体是民族国家;(2)一体化是国家间合作的一种制度化形式;(3)超国家的制度本身(主要是欧盟委员会)并没有独立的行动能力——即使有,影响也是很小的,成员国主导着一体化的进程。

第二种理论立场是新功能主义,也可以称为超国

\* 本文得到外交学院“中国-欧盟研究中心项目”的资助,特此致谢。

家主义。厄恩斯特·哈斯是这一理论的代表。新功能主义认为,尽管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启动是由于成员国之间的协议,可是后来的发展却大大背离了它们的初衷。为了实现一个领域的合作就必然牵动其他部门的合作,导致了功能性外溢和非本意结果。这样,一体化进程中成员国日益卷入,以至于不断转移主权职能,国家职能渐渐被掏空。伴随着这一进程,社会行为体的认同也逐渐从民族国家层次转移到超国家层次,而认同的转移也促使社会行为体的行动日益转移到超国家层次。我们可以将新功能主义归结为以下几点:(1)一体化的行为体不仅包括民族国家,也包括社会行为体;(2)一体化是民族国家职能不断转移到更高层次的过程;(3)一体化进程充满偶然性因素,是一个缓慢的逐渐社会化的过程。

政府间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在解释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上无疑是有一定解释力的。但是,这两个理论都有自己的缺陷。新功能主义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功能主义理论的模糊性。事实上,欧盟任何政策领域的发展以新功能主义进行解释都显得很有道理。这样就导致了新功能主义什么都能解释,但是却好像又什么都没有解释。第二,根据新功能主义理论的解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度发展要伴随着大众认同向超国家层面制度的转移。事实上,正如琼斯所指出的,欧洲晴雨表的调查根本看不到大众认同的明显转移;<sup>[2]</sup>第三,新功能主义理论的初衷只是解释经济领域的一体化。甚至哈斯本人都明确认为,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并不适用于政治与安全一体化。

同样,政府间主义也存在很多不足,表现在:第一,政府间主义,尤其是自由政府间主义明确声称,其理论只解释欧洲一体化中的关键过程和重大制度的创设。因而,这就导致政府间主义脱离了对一体化进程的解释,没能够把握一体化中进程因素的作用。第二,随着国际关系中建构主义、反思主义被引入欧盟研究,政府间主义的理性选择解释越来越遭到学者的批评,凸显出政府间主义的缺陷所在——忽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社会化机制,将国家利益和行为体偏好看作是外生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

更值得指出的是,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看作是单向的过程。这类研究只看到了国家或者社会行为体对欧洲层面制度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方面,亦即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对成员国的影响。这就要引入“欧洲化”视角。

## 二、“欧洲化”视角

过去十多年里,没有人可以否认“欧洲化”<sup>[3]</sup>研究已经成为欧盟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事实上,就连“欧洲化”概念本身都存在非常大的争议。罗伯特·拉德奇(Robert Ladrech)在1994年提出了一个重要定义:欧洲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成员国的政治趋向和形式(shape)得以重新定位,使得欧共体的政治与经济动力成为成员国政治与政策制定的组织逻辑的一部分。<sup>[4]</sup>显然,这种界定强调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看待欧洲化的作用,并且强调欧洲化是一个进程。与之相对的是玛丽亚·格林·考尔斯(Maria Green Cowles)、詹姆士·卡波拉索(James Caporaso)、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等人的定义:欧洲化就是欧洲层面独特的治理结构的出现及发展,也就是指能够将行为体之间互动正式化的政策网络(亦即与政治问题相关的政治、法律与社会制度以及欧洲规则)的出现。<sup>[5]</sup>这一定义强调了欧洲化的结果。综合来看,我们大致可以将欧洲化的定义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指的是:民族国家将自己的制度、政策、规范、偏好等上传(upload)到欧洲层面,进而实现欧洲层面制度建设的过程,这是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第二种类型则是指:欧洲化是欧洲层面的制度、政策、规范等下载(download)到成员国(或者非欧盟成员国)的一个过程,这是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是成员国(或者候选国)逐步调整并适应欧盟层面的制度发展。目前,关于欧洲化的研究文献中,绝大多数是将研究重点放在欧洲化研究的第二个方面,亦即欧洲层面的制度、规范给成员国(或者候选国及非欧盟成员国)造成的冲击及其反应的过程。<sup>[6]</sup>

欧洲化研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从1986年《单一欧洲法令》签署以来,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加快。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成员国一致采用自由主义的经济规则,政策调整压力尤为巨大。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欧元的诞生,欧盟的东扩,要求成员国在政策、制度上进行调整,其涉及面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而欧盟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渗入到欧洲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基于这种背景,欧洲化研究超越了传统欧洲一体化理论对超国家层次的研究,转向了对国内层次的研究。而直接触发这种转向的最初原因是由于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迫切需要加入欧盟,为此不得不按照欧盟的要求在国内行政、制度、政策等方面作出一系列的调整。伴随欧盟政策越来越深入成员国及其候选国

的社会内部, 导致了其政治与政策调整、适应上的差异, 进而在学术研究上就出现了关于欧洲层面制度建设对成员国影响的研究。

从理论角度上看, 之前的欧洲研究都是关注自下而上的影响, 也就是民族国家层面的政策、偏好如何影响了欧洲层面的制度建设。从冷战结束以后, 欧洲一体化研究开始关注欧洲层面的政策对成员国国内层面制度的影响。<sup>[7]</sup>1994年安德鲁·莫拉维斯克的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从未正式发表)<sup>[8]</sup>中就谈到, 欧洲一体化进程导致了国内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 因而增强了成员国, 特别是其成员国的政府的力量。鉴于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是自下而上地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 莫拉维斯克的这一观点无疑是颇为引人注目的。韦恩·桑德霍尔茨(Wayne Sandholtz)也认为, 一体化能够给国内行为体在选择盟友和(多层政治的)领域提供新的选择, 引导着国内制度与政策的变化。贝娅特·科勒-科赫(Beate Kohler-Koch)同样注意到, 欧洲“治理转型”导致多层权威中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sup>[9]</sup>尽管这些研究都涉及到欧盟层面对成员国国内政治的影响, 但是这种研究都只不过是维护这些作者关于欧洲一体化和欧洲治理的观点, 而不是为了探讨欧洲化本身, 他们主要关心的都不是超国家层次如何影响国内层次。尽管如此, 这些研究还是开启了欧洲化研究的大门。<sup>[10]</sup>

欧洲化研究更深层的学术背景源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事实上,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 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就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颠倒的第二意象”(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其研究的焦点是国内变化的国际根源。<sup>[11]</sup>随后, 在1986年出版的《艰难时代的政治: 各国对国际经济危机反应的比较》中, 古勒维奇认为国内政治的差异导致了对国际压力的适应表现有所不同。这一研究与后来的欧洲化研究在学术理路上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影响欧洲化研究的还包括全球化研究和建构主义研究。全球化研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此不再赘述。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转向给欧洲化研究带来了全新面貌, 不仅大大扩大了欧洲化研究议程, 也丰富了对欧洲化机制的解释。建构主义的引入, 使得欧洲化研究不仅关注了正式制度, 也看到了非正式制度(规范)的影响所在。同时, 不仅使人们看到了“后果性逻辑”机制在国内适应调整中的作用, 也注意到了“适当性逻辑”的深刻影响。下表就是戴森和葛兹对第一代和第二代欧洲化研究的总结

和比较:

戴森和葛兹对两代“欧洲化研究”的总结<sup>[12]</sup>

第一代(70年代)	第二代(90年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采取由上至下的研究角度, 要解释的是国内对来自欧洲层面的压力的应对</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同时强调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的双向影响, 以及水平和垂直的相互影响</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假定欧洲层面和国内层面“不吻合(mismatch)”, 特别是在法律、制度和程序上</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更强调利益、信仰、价值观和观念: 吻合的政治动力</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强调国内层面非自愿地、反应性地(reactive)进行适应调整</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更强调国内层面通过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和学习而自愿进行的适应调整</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集中于政策与政体(polity)方面</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更强调政治、认同、选举行为、政党及政党制度</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认为各个国家会日益趋同</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强调欧洲层面导致的不同影响</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采用实质性的术语来界定欧洲化——集中在欧洲化影响的“最终状态(end state)”上</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强调欧洲化对国内政治、制度和政策动力的影响</li> </ul>

### 三、欧洲化机制及变量的操作化

“欧洲化机制”指的是欧洲国家国内调整并适应来自欧洲层面的政策、规定和规范等的动力。根据马奇(March)和奥尔森(Olsen)的研究, 制度之所以得以遵守, 原因在于两个逻辑: 适当性逻辑和后果性逻辑。前者指的是行为体由于内化了制度规范, 或者是其认同与制度一致, 因而遵守并调整适应来自欧洲层面的制度与规范, 称之为“社会化”机制。后者来自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指的是行为体基于利益、成本、机会、权力等方面的权衡而遵守并调整适应欧洲层面的制度。事实上, 这两种逻辑并不矛盾, 经常同时在欧洲化进程的不同阶段中发挥作用。而且, 欧洲化的影响在不同政策、政体和政治中也是不同的。决定这两种逻辑在欧洲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因素也是不同的: 适当性逻辑取决于规范倡导者(norm entrepreneurs)及政治文化的特征, 而后果性逻辑取决于多个否决点(multiple veto point)以及行为体之间制度资源的分配。<sup>[13]</sup>克里斯托夫·尼尔(Christoph Knill)和德克·莱姆库尔(Dirk Lehmkuhl)按照欧洲层面的决策的三种类型, 将欧洲化机制分为以下三种:<sup>[14]</sup>

1. 当欧盟决策采取“积极一体化(positive integration)”的形式时。此种情形下, 欧盟规定了一种制度模

式,要求成员国国内按照要求进行调整,而成员国仅享有有限的行动自由。例如,欧盟的环保政策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化就有赖于国内制度和欧盟制度安排之间的吻合度(goodness of fit)。可以说这一机制在欧盟第一支柱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可是具体到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这种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因为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中,欧盟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并不具有很强的法律约束力。

2. 当欧盟决策采取“消极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的形式时。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的立法改变了国内博弈的规则,影响了国内行为体的资源和权力分配,进而改变了国内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例如,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就是如此。这里,欧洲化就不是制度吻合或者不吻合的问题了,而是欧盟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内行为体的战略地位。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中可以看出,这一机制目前在欧盟防务市场的建设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3. 当欧盟决策改变了国内行为体的信念和期望,进而导致偏好和战略变化以及制度的调整适应时。这种机制被看作是“一体化的框定”(framing integration),可以用“社会化”来表述这一机制。就目前的发展阶段而言,这一机制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欧洲化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防务局发布的《防务采购行为准则》,虽然从法律上说并没有约束力,但是却大大地提高了欧洲领导人、企业家及普通公众对于建设欧洲防务市场必要性的认识。

在尼尔和莱姆库尔的基础上,维维恩·施密特(Vivien A. Schmidt)进一步推进了欧洲化机制的研究。<sup>[15]</sup>她的研究证实了欧盟的政策对成员国的国内影响并不一样,欧洲化的程度还取决于不少干预变量的影响。她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成员国在面对来自全球和欧洲的经济压力时所表现出的经济脆弱性;(2)政治制度在必要时的应对能力;(3)欧盟政策与国内政策传统及偏好的吻合度;(4)影响政策偏好,进而影响到脆弱性及适应能力的话语。

托马斯·里斯和詹姆士·卡波拉索及玛丽亚·格林·考尔斯主编的《欧洲的转变:欧洲化与国内变化》<sup>[16]</sup>一书是欧洲化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在这项研究中,里斯将欧洲化的研究和新制度主义(包括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结合起来,探讨了如何对欧洲化研究中的核心变量进行操作化,这一方法也是目前这一研究中最为流行的。他们将国内层次和欧洲层次政策、规范之间的吻合度作为

自变量(也就是国内变化的必要条件),而国内层次的适应性调整(domestic adaptation)作为因变量。如果欧洲层面和国内层面的吻合度很小,那么来自欧洲层面的变革压力就越大,国内的适应性调整也就需要更加大。<sup>[17]</sup>

在因变量的操作化上,根据里斯等人的研究,可以区分出三种程度的国内变化:吸收、容纳、转变。吸收(absorption)指的是成员国可以将欧盟的政策和观念并入到现有的制度结构中,同时不需要改变现有制度、政策、进程,因而国内变化的程度较低;容纳(accommodation)指的是将调整现有的进程、政策和制度,同时并不改变其本质特征和对它们的集体理解(collective understanding),从而能够容纳欧洲化压力,国内变化的程度适中;转变指的是以欧洲层面的政策和规范取代现有的政策、制度和进程,因而国内变化的程度较高。

里斯及其同事的这项研究启发并引导了欧洲化研究。但是也有不少学者,例如马库斯·哈弗兰(Markus Haverland)就批评这种研究,认为将成员国既有政策和欧盟政策之间的吻合度作为自变量存在误差,欧盟成员国的政策调整程度(亦即欧洲化程度)实际上并不受吻合度的影响。<sup>[18]</sup>克劳迪亚斯·拉德里(Claudio M. Radaelli)和斯托夫·尼尔、德克·莱姆库尔的观点一样,认为在欧盟的不少政策中成员国的调整并不是由于政策之间的不吻合,而是为了规则的竞争(regulatory competition),如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对于技术标准的相互承认。为此,拉德里创造性地提出了欧洲化的“软机制(soft mechanism)”。尽管如此,坦贾·博泽尔(Tanja A. B rzel)和里斯还是认为,成员国政策和欧洲层面政策之间的不吻合(misfit)是国内变革调整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足条件。因为,欧洲化还受到诸多国内干预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吻合度并不是静态的,欧盟和成员国的制度设置一直处于变化当中,而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reciprocal effect)。<sup>[19]</sup>事实上,里斯等人的这种研究框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将理性选择机制和社会化机制都包容进去了。因而凯文·费瑟斯通(Kevin Featherstone)指出拉德里的研究可以被看作是对里斯等人的研究框架进行细化,而不是对它的排斥。<sup>[20]</sup>尽管如此,近年来的诸多研究仍然是对里斯这一框架的细微补充。

#### 四、结语

欧洲化的研究摆脱了过去将成员国看作一成不变的行为体,开始重视欧洲层面的压力和规范对成员国

的塑造。正因为如此,詹姆士·卡波拉索认为,欧洲化研究是第三代的欧洲研究(第一代是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第二代是治理研究)。<sup>[21]</sup>尽管如此,这一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需要厘清欧洲化研究与全球化研究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成员国的政策转向,还是机构的调整,是否与全球化进程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呢?是否除了欧洲化本身的作用,全球化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呢?这是欧洲化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因为欧洲化进程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因而,在理论上,就很有必要将两种进程区分开来。

其次,欧洲化进程本身是否与国际体系的巨大变革有莫大的联系呢?国际体系变革是否给欧洲化进程带来了机遇和压力呢?欧洲化进程的加速与单极体系是否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呢?现实主义者质疑:欧洲化其实就是单极世界下欧洲国家的制衡行为。如何能够为此作出解释呢?这也是一个难题。

即便如此,欧洲化研究前景光明。一方面它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既可以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角度,也可以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欧洲化研究涉及到欧洲研究的方方面面,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研究。目前欧洲化研究需要进一步的实证,要脱离过去描述性的解释,提供更多有力的经验证据,还需要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研究、全球化研究结合起来,共同推进对欧洲化本身的解释。

#### [注释]

- [1] Graziano, Paolo and Maarten Vink(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 46.
- [2] Seth Jones, *The Rise of European Security Coop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1.
- [3] “欧洲化”这一概念和“布鲁塞尔化”、“欧盟化”存在相通之处,但是两者通常指的是欧盟层面的制度建设,而“欧洲化”的概念内涵则丰富得多。
- [4] [5] Ian Bache, *Europeanization: A Governance Approach*, see [http://aei.pitt.edu/554/02/Bache\\_EUSA.doc](http://aei.pitt.edu/554/02/Bache_EUSA.doc).
- [6] 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化的第一个定义事实上是过去研究的

焦点,而欧洲化研究的所谓“新”体现在第二层定义上。基于此,下文提及的欧洲化均指的是第二层的定义。

- [7] 根据戴森(Dyson)和葛兹(Goetz)的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关于欧洲化的研究,可参见 [http://aei.pitt.edu/554/02/Bache\\_EUSA.doc](http://aei.pitt.edu/554/02/Bache_EUSA.doc).
- [8] 见 <http://www.princeton.edu/~amoravcs/library/strengthren.pdf>.
- [9] [10] Graziano, Paolo and Maarten Vink(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s*, p. 49.
- [11]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 4 (1978), pp. 88†912.
- [12] See [http://aei.pitt.edu/554/02/Bache\\_EUSA.doc](http://aei.pitt.edu/554/02/Bache_EUSA.doc).
- [13] Kevin Featherstone and Claudio M. Radaelli (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5-16.
- [14] Christoph Knill and Dirk Lehmkuhl, *How Europe Matters.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Europeaniz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 3 (1999) N 7. See <http://eiop.or.at/eiop/pdf/1999007.pdf>. 本文以下的归纳部分来自 Kevin Featherstone and Claudio M. Radaelli (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p. 14.
- [15] Vivien A. Schmidt,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Policy Adjustment*,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 5, No. 6, June 6, 2001. see <http://ssrn.com/abstract=302780>.
- [16] James Caporaso, Thomas Risse, Maria Green Cowles(eds.), *Transforming Europ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7] Tanja A. B rzel and Thomas Risse, *When Europe Hits Home: Europeanization and Domestic Change*, European Integration online Papers (EIOP) Vol. 4 (2000) N 15, see <http://eiop.or.at/eiop/pdf/2000015.pdf>.
- [18] See [http://www.iue.it/RSCAS/WP\\_Texts/99\\_17t.htm](http://www.iue.it/RSCAS/WP_Texts/99_17t.htm).
- [19] Kevin Featherstone and Claudio M. Radaelli (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pp. 16-17.
- [20] Kevin Featherstone and Claudio M. Radaelli(eds.), *The Politics of Europeanization*, p. 17.
- [21] James Caporaso, “The Three World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in Graziano Paolo and Maarten Vink (eds.), *Europeanization: New Research Agendas*, pp. 23-34.

作者简介: 林民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 讲师。(北京, 100037)

收稿日期: 2008-11-16

修改日期: 2009-01-08

---

**50** Europeanization approach: New Perspective for CFSP studies

by *Lin Minwang*

“Europeanization approach” has become a new perspective for CFSP studie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rise of Europeanization approach, traces its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The author holds that Europeanization approach breaks from traditional theories, and focuses on the effect of European level on member states, and thus constitute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CFSP studies.

## Countries and Regions

**55** Russia Defence Industry and It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n Military Technology

by *I. A. Maximtsev & A. E. Karlik*

The article clearly defines the concept of defence industry, explores the adjustment of the orientation, structure, and sp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defence industry, and presents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ssian defence industrial Complex. The article also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ructural composition of military expenditur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 S. The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state of Russia — China cooperation in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uch cooperation.

**60** Analysis of the Multi-level Policy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EU

by *Zhu Guichang*

A multi-level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timely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EU law and policy.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on the one hand, strengthened its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with Member States' relevant authority, and established a centralize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comitology and infringement proced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cooperated with societal actors such as Union citizens, corporations, interest groups and NGOs, and established a diffused and indirect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social supervis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European law in the Member States.

**65** New Labour and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by *Shi Tongyun*

Defining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has never been an easy job as being British is a variable ideology. The New Labour government interpreted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as a conjunction of historical past and political future, the past being British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future referring to a “new and creative Britain”.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new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country's own ethnic and cultural complexity, New Labour led by Tony Blair responded with “rebranding Britain” into a democratic, creative, modern and multi-cultural state. Gordon Brown, the present Labour Prime Minister, has promised fairness in tapping everyone's potential, so as to achieve harmonious fusion of people.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calls for efforts from all parts to contribute and compromise.

**71** Analysis of The German Government's Policy of Making More Employees Small Capitalists

by *Yin Tongsheng*

The adoption of a draft law by the German coalition government on August, 27, 2008, on raising the proportion of employees' holding of means of production, that is to say, the promotion of employees becoming small capitalists, incurs strong reaction among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Marx has in depth exposure of the social system of capitalism and the problems revealed in employee participation prove that the exposure still holds tru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ssu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history of employee participation, the current state of employee participation, the new policy and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its introduction and the general evaluation of the new policy, hoping that this will invite comment and discussion.